胡适先生密友 乐清人高宗武

■记者 黄崇森

胡适先生是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，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深远的影响。在他波澜起伏的一生中，似乎与乐清人特别有缘分，先后与两位乐清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，一位是他晚年的秘书胡颂平先生，另一位是与他交往长达26年之久的高宗武。高与胡适先生的交往，少数近代史专著时有涉及，但都简略，近年来随着一些罕见资料的出版，他们两人交往的脉络和深度才渐渐清晰了起来。

高宗武让胡适先生佩服

胡适先生是民国时代的风云人物，但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时，比胡年轻十多岁的高宗武，就用自己的才干和魄力折服了胡适。

胡适与高宗武相识当是1936年6月7日，地点在北平（今北京）胡适的家中。两天后的6月9日，胡适致函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，提及这次与高宗武的会见，他说：“今日政府中外交人才最缺乏。前夜见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君，与他谈了三点钟，我佩服此人的才干与魄力。此公颇能明了我的计划，希吾兄与他细细谈谈。”

很多年后，1976年6月7日，高宗武在一封致友人的信函中也说：“大约40年前，有一天晚上我去看胡适之先生，是一位当时北平军分会的刘将军陪我去的，我只记得刘是安徽人，与胡同乡，是何敬之的办公室主任，名字我没有记得。”

何敬之即何应钦，是民国时代军事上的著名人物。

在高宗武的晚年，他曾向孙子高昕绘声绘色地提到与胡适的第一次相会：胡适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，久仰你的大名，今天才得相见，非常高兴。我说，先生是第一次见我，我却不是第一次见先生。我早见过你，只不过你在台上，我在台下听先生的讲演。”

胡适对高宗武说，“久仰你的大名”，也不是客套话。因为高1931年从日本留学回国，担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教授后，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对日本的时评文章，引起了国民党和知识界高层的关注。1934年5月，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、帮办，第二年便升任为亚洲司的司长，堪称外交界的一位大红人。

从“七七事变”至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，高宗武与胡适在南京交往频繁。1937年7月30日，胡适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，到高宗武家中午餐。在座的还有高的其他朋友和同事。席间，就对日作战问题，胡适问高宗武：“你有何高见？”高回答：“我的姓虽然高，我的意见却很低。”从此，高宗武、胡适等主张侧重于以外交路线解决中日矛盾的人士，得了个“低调俱乐部”成员的名称。

虽然后来在对日问题上，胡适观点改变，与高宗武也有分歧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，两人已发展为生活上的密友。高宗武的夫人沈惟瑜（非原配）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外语系，谈及第一次见胡适时说：“1937年8月的一个上午，我的未婚夫要胡适和他一起来看看我。”介绍胡与自己女友相识后，高又说：“我带你看一个更漂亮的女人——沈惟瑜的嫂子。”高与胡由个人友情发展到通家之谊便由此开始。

后来胡适还认识了高宗武的哥哥高公度等高氏的家人和亲属。

两人第一次相聚于美国

根据近年公开发表的高宗武与胡适来往的26通书信和其他档案资料，两人发展起更密切的关系是在1940年5月高宗武到美国后。

1938年2月，高宗武受命去香港以开办“宗记洋行”为掩护，实际对日进行秘密外交。不久，高宗武觉察到自己曾努力的中日“和平运动”，已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陷阱，成为汪精卫卖国的借口，在师友的帮助下，毅然悬崖勒马，偷出《日汪密约》，与陶希圣逃离上海，在香港《大公报》上全文发表，震惊海内外，史称“高陶事件”。随后，受国民党高层密令，高宗武化名“高其昌”，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的名义赴美，在时任驻美大使胡适的安排下，从此在华盛顿过着半隐居的生活。

流落异乡的高宗武对胡适这位老友倚重甚切，而胡也没有辜负高的期望。1940年5月21日高宗武夫妇到达纽约，22日胡适即从华盛顿赶到纽约见面。在胡的关照下，高夫妇29日抵华盛顿，暂在使馆吃住。在胡外出演讲时，由三秘游建文及夫人照料。6月15日，高宗武夫妇迁入康涅狄克花园415号，两年之后搬至Kalorama Road 1915号，60年代中期又迁居Van Ness公寓，过上自谓“在简单中求安定，在苦闷中求清静”的生活。

高宗武受到胡适的悉心照顾，曾引起胡适的学生傅斯年极大的不满。傅斯年外号“傅大炮”，他给老师胡适发去一封充满火药味的信，大骂高宗武，但胡对高的友情并未因此而受影响。至1946年7月，胡适从美国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，这六年多时间，胡与高夫妇交往相当密切，据高宗武的日记，几乎每周都有相聚。

在那些年中，高宗武每年会收到国民党高层特批的生活费3500多至4800美元不等，有好几次也由胡适转交给他。

抗战胜利后，高宗武曾有回到国内重新出山的想法，在北平的胡适及时向他通报相关的情况，劝阻其回国。后来有人分析，如果当时高宗武回国，可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，后半生可能也会有大的变动。此事幸亏胡适等人阻挡。

高宗武帮助胡适炒股票

1947年12月，中间人传来消息，说因为时局艰难，国民党高层对高宗武的特批生活费可能会中断。无奈之下，高宗武拿出一部分积蓄去投资股票，未曾想，一出手即获得丰厚回报。从此，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股市中。慢慢地，朋友中也有人委托他炒股票。

从1949年4月赴美到1958年4月到台湾就任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，这段时期是胡适生命中的“最黯淡岁月”。初来美国时，他经济上颇为拮据，银行存款只有1800美元，只好自己上街采购食品蔬菜，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，招待客人只能煮茶叶蛋。

1950年夫人江冬秀来美后，家境有所好转，他们夫妇把闲散的积蓄拿出来，请高宗武夫妇代买些股票。1951年1月9日，胡适给高宗武写信说：“我现在寄上三千美元，一切归老兄调度。此钱本是idlemoney（闲置货币），老兄全权使用，如有损失，决不可由老兄负责。老兄一定能相信，我说这些话是完全诚心的。”到1954年底，这3000变成了5000，胡特意致信高表示感谢，并追加一笔钱请高宗武代为投资，同时强调“此款与前款一样，完全归你支配。有赢余，是老兄之厚赐，有损失是‘兵家之常事’，我决不会丝毫怪你”。

1955年9月底，美国股市大跌不止。10月18日，胡适特地写信给高宗武，说：“将来无论如何变动，老兄切不可为我那几千元的款子忧虑。我早就对老兄就过，那是我不用之款，即使完全亏损，我决不会因此冻馁。我知道老兄为人，必定是为朋友担忧比为自己担忧更关切，所以我屡次想向老兄说这几句话。现在纸上说了，一定不能有面谈的达意，但我盼望老兄深信我的诚心。”

胡适对交给高宗武的钱投资股票之事，从来不主动过问，也不结账，并且只在1960年底动用过一次。其时，胡适在台湾所坐的公车已破旧，他不想用公家的钱买，便写了一封信给高宗武，要了2416.82美元买车。

胡适突然病逝后，高宗武为胡的股票结账，将本利现金全部交给了江秀冬女士。总的数目没有记载，只有第一笔投资3000美元的清单一份偶然保留下来，至1962年2月23日，投资结果为11501.76美元。扣除所得税和买车款，第一笔投资，最后交给江秀冬女士的是7123美元。

1955年在美国高宗武夫妇与胡适一起外出游玩。

高宗武家成了“高家酒店”

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时，常与高宗武一起品酒聊天。他最喜欢高宗武调配的马蒂尼酒，因为他经常去高府喝酒，就戏称高府为“高家酒店”。1958年底，他在一封信中深情地写道：“宗武、惟瑜：日子过得真快，九月初别后，到现在已近三个月了！你们都好吗？时常想念你们。”接着，说了一通琐事，又写道：“时常想念华府的许多朋友，见面请代我问好，也时常想念高家的酒。”

其间，高宗武还为朋友崔存璘在外交部升职的事，请胡适帮忙。事成后，胡向高写信道：“此已是超出弟平时戒律，望兄但告崔君，勿告外人，因恐外人知或于崔君反不利也。”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，一向持身谨严的胡适不可能为高宗武“契篮子”。而胡适不愿见某些人，这些人也会通过高宗武做工作，让胡适改变主意。

后来胡适回国，“高家酒店”暂时停业。1949年4月后，胡适又长住美国华盛顿，“高家酒店”又重新开张。沈惟瑜曾在一遍文章中写道：“胡适、梅校长（梅贻琦）、钱校长（钱思亮），三人刚到华盛顿有点事情，一连几天，都在我们家里喝酒谈天。”有时，这些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也打几圈麻将，深夜后由沈惟瑜做夜宵款待。为了方便交流，胡适与美国人打麻将时，把红中、发财、白板译作red、green、white，东、南、西、北风称为east、west、soufh和north，饼是dot，条是bamboo，万是number。

这样的时候，胡适的心情最放松，酒局中或酒后时常与高宗武等人吟诗做对，至今高家后人还保留着胡适在一张纸片上，歪歪扭扭写着的一首打油诗：

大姑娘，二十一，
配个姑爷一十一。
昨儿井边去抬水，
一头高来一头低。
要不是爹妈待我好，
一脚踢你在井儿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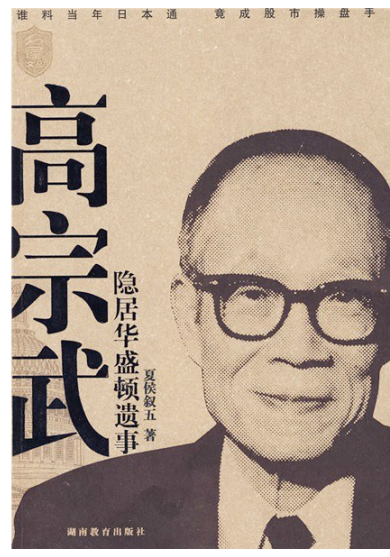
1950年10月某一天，看到年轻的沈惟瑜赋闲在家，胡适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鼓动她写“胡适传记”，又开玩笑地说：“叫宗武给你做饭。”高宗武表示支持。于是，沈惟瑜真的开始收集资料，悄悄动手写了起来。胡适对沈惟瑜为其写传记提供了尽可能的帮助，沈要他的著作，他都一一收集给她。到1955年12月，沈惟瑜已经立出了一个写作纲要，并提交胡适。这个月的12日，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，说到此事：“胡先生：多谢你送给我的《胡适文选》及一篇生平概要。我相信这对我的写作是最大的帮助。我将照你所告诉我的意思去进行。希望明年年内交卷。”

但令人遗憾的是，沈著的《胡适传记》最终没有完成，否则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可能没机会写《胡适口述自传》。不过，在胡适传记的大厦上，另一位乐清人胡颂平最终写出了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》和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，也算是替沈惟瑜了却了心愿。

1967年4月5日，陶希圣、高宗武重逢于敦巴顿橡园。

注：本文参考资料有《胡适日记全编》、《高宗武回忆录》、《日本真相》（高宗武著）、《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》（夏侯叙五著）、《江淮文史》（收录高胡通信26通）、民国版的《近代各国外交政策》（收录高宗武一篇长文）以及胡长明先生《高宗武和胡适交往档案》等。

照片为黄崇森翻拍。



胡适陵园里最后的哀悼
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胡适到台湾任职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后，又与高宗武分别了，但两人书信不断。1960年7月9日，胡适离台飞往美国西雅图，参加“中美学术合作会议”。8月18日赴旧金山演说，深夜休闲之时，他抄录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两首《桂花曲》诗，寄给了高宗武玩赏。

1962年2月24日，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。高宗武夫妇在华盛顿得知消息，悲痛万分。胡适长子胡祖望赴台奔丧，因政治原因没法前往吊丧的高宗武，送他去机场时说：“二十多年来，我未曾写过一篇文章，但对胡先生之丧，我立意要写一点，表示哀思。”回到家中，他写了一副挽联寄达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：

离中原数万里，光阴忽忽，唯食事忙，旅邸苦寂寥，最难忘海外重逢，高轩频顾，茶余酒后，意豪兴浓，执手温存话世事。

溯交谊三十年，相关息息，无微不至，平生感知己，岂讵料世运蜩螗，文星遂殒，风悲云暗，海啸地震，伤心痛苦为苍生。

这副挽联为他们两人一生的友谊做了很好概括，感人至深。

1967年7月，正当烈日炎炎的酷暑之时，高宗武携夫人以“观光”名义抵达台北，会见了很多老朋友，有乐清籍的南怀瑾、叶会西（叶永蓁），还有国民党高层何应钦、张群、陈立夫等人。他和夫人17日夜抵台，18日下午即去看望江秀冬，19日下午在友人陪同下，来到南港的胡适陵园。年事已高的江秀冬要陪同，被沈惟瑜劝阻了。不料，他们两人一到陵园，发现江秀冬早已等候多时。

在胡适墓前，高宗武夫妇行了三鞠躬礼，夫人沈惟瑜触景生情，泣不成声，而高宗武双手摸着墓石，不觉凄然泪下。

高宗武生前常对人说，他一生最佩服的人有两位，之一就是胡适先生。不过，另一位多少有点出人意料，是杜月笙。

当代研究胡适的专家胡长明先生评论说，胡适于高宗武，是亦师亦友的关系，两人的友情跨越二十余年，历久弥笃，举凡存问、帮扶、切磋、激励等朋友之伦中的应有之义，皆被他们发挥到极致，堪称近代史上的一段奇缘。

更难得的是，高胡两家交情还在延续，胡适的儿子、孙子辈与高宗武的儿子、孙子辈也都是好朋友。

高宗武夫妇年轻时在香港合影。